

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不同问题与“视域融合”

□王 贺

重述研究史

谈及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史料热”、文献史料的“繁荣”局面,或是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贡献,论者多强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承担、完成,后来者承其余绪、勉力前行的结果。这样的叙事模式固然不能说错,特别是站在建构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现代文学文献学、当代文学史料学等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形塑这一学术传统、遗产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术、教育制度之力也同样值得重视。

意识形态方面,不惟有文化、文艺政策此一面,实际上,重视资料工作且身体力行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早在19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其后文化部又颁发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未决定图书分类法以前整理图书的一个临时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指导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处保存、整理资料,及至新的图书分类法问世尤其新时期以来,相关工作更形规范、成熟。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提出“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但研究不能没有资料,重视对大学及其他文化场馆所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也就不言而喻。简言之,1949年后,来自学院内外的学者们整理、研究这些资料的理论与实践,与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笔者前此曾撰文分析过1949—2019年间学术与高等教育在空间上的差异,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及文献资料利用制度的变化等多重因素在现代文学文献研究领域所造成的影响和限制(参见《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当代文学史料领域大率如此,但与现代有所不同,早期受作协体制影响较大。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因大学体制、学科制度、学术制度的变化,与当代文学研究不断历史化、知识化的“内在理路”相耦合,至今已渐成风气,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仍有待检讨、发展和完善的问题和现象。当然,相较于现代文学而言,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种类更多、数量更为庞大,且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状况之中,更具有丰富的研究可能。但可以肯定地说,倾心于整理当代文学史料,或是从文献史料出发、重新整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理念目前尚未普及,与之相应的若干做法目前也才刚刚起步,一切还有待观察。

共通的难题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文献史料无外乎包括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作家书信、日记、

回忆录等。一般而言,可分为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书目编目、年谱、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佚文的搜集、书刊的影印和复制等)、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考辨性史料七大类。不过,我们平常搜集、整理、利用最多的仍然只是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作家书信、日记、回忆录这几种,而档案资料、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长期以来未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史料者的视野,立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本位,对其进行大规模整理和研究,似也无从谈起。因此,其之于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仍须予以申说。

档案资料方面,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展开过程中,学者们就曾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目前也已出现一些利用档案资料研究作家生平传记经历、作家群体的文学与学术活动、“思想改造”运动、第一次文代会及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等方面的论著,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运用档案资料(或以之为主要参考资料,或与其他资料参证)研究现代、当代文学者仍不多见。特别是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与其关系比较密切的“革命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及建国初期历史档案目前在研究中利用率不高”。实际上,作为“直接形成”的“过程史料”,“它们可以为文学组织研究提供作家、编辑、批评家在单位制度下原生态的生活史料。”“为经典文本提供可以比勘的‘现实版本’,可以打开有关个人想象、社会再现方面的问题空间。此外,对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档案亦可提供‘不宜公开’的珍贵史料。”(张均:《档案文献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

地方文献方面,早在194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中就提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此后,地方志编修传统虽曾一度中断,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恢复,但对于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在各地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处仍然继续进行着,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收藏。其中,也有不少现代、当代文学史料,不仅可为研究、撰写地方文学史和国别文学史提供新资料,还可补正其不足,订正其错误,并用于研究地方社会文化、民间文化,但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此普遍重视不够。最近关于莫言、余华等作家早期生平创作经历的研究,开始搜集、利用地方文献,但若是就其总体状况而言,仍有待开掘、整理和研究。

与地方文献仍可来自地方政府、精英人士之手不同,民间文献来源于每一个“无名”的普通人,其中既有乡民、市民、侨民,也有一般所谓的“乡土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作

者。就其文献类型而言,既有契约文书、乡规民约、账簿、族谱、碑刻、日记、笔记、生活杂记、自传、年谱等常见资料,也包括科仪本、唱本剧本、课业文章、书通信札、日用杂书、地理书、善书、医书及庙宇红榜、村头村尾的张贴告示等,内容相当丰富。若欲重构一个村落或社区的文学、文化历史,自须对上述材料有相当之倚重。近年来出版的多种大型民间文献丛书及目前已建成及规划中的多种民间文献数据库项目,正可为我们展开这方面研究提供帮助。但与华北、华南、华东等地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较充分相比,西北、西南等地尚有许多空白,迄今学术界对民间文献的利用仍嫌不足。

不过,也许应该指出的是,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对地方文献、民间文献的重视背后,隐藏着一种文献与田野并重,文献搜集、实地调查、实物寻访与人物口述、访谈融为一体的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论中,不仅蕴含着德国19世纪史学和德国近现代“疑古”学派所强调的“史料批判”意识,还强调了文学研究的想象力。仅仅将其视作对一种特定类型的文献史料的开掘和利用的做法,则颇有几分近似于阿马蒂亚·森所谓的“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也正如科大卫所说,“历史学者研究的文献,来源于田野;田野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达官贵人的官邸。文献怎样产生,怎样流传,什么文献保留下来,什么文献没有,都在某类田野经历过一定的时间。它活在田野之中,有的仍然活着。历史学者若不能从文献看到田野,他或她只是一个抄袭的机器。从田野的角度读文献,文献的内容是一层一层的,原来某句话经历过解读,又放了另一篇文献之内,如此转手多次,才到达历史学者的视野。您有兴趣知道的,是文献的哪一层呢?您又有多少田野的幻想,帮助您看出其中的变化?我们这些城市长大、五谷不分的人,不跑田野,怎样可以有看透文献的想象力?”当然,文学(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有所不同,前者多关注精英人物的、极具原创性的文本,亦即一般所谓“第一流作品”,而后者描述、理解社会和历史的变迁,自可发展出不同于上流社会、精英人物的庶民立场、视角,自下而上来重新理解和解释历史。

除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给予我们的丰富的启示,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传统内部也不乏先例。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歌谣、谚语、传说、儿童文学的发掘、讨论和利用,虽是基于将传统文学、文化视为贵族、精英文学的观念出发,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语、国族文学和新的文化、文明形态,但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农村生活的浪漫化、理想化的立场,较为缺乏法国年鉴学派所谓的“民众思维”,或是以“地方性知识”视角理解农村,以“街角社会”理解城市生活逻辑的理论和自觉。但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理念、方法及其对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深入解读,仍

有相当可资借鉴之处。也正如已有的部分成功的研究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档案资料、地方文献、民间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之后,往往会有新的史观、史识(有时可能显得比较细小、具体),这不正是我们所渴望的吗?

不同问题和“视域融合”

尽管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有上述共通的难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各自面临不同的具体问题。极为概括地说,现代文学文献重研究胜过整理,常见文献、基本文献大多现已整理出版,相关研究也已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化的倾向,建立一个完整、独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已成为许多这一领域学者的追求,但这一领域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太具体或碎片化,而恰恰是研究过程中问题意识的匮乏。也正因此,一篇或一组新发现的作品和评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写既有的文学版图,就成为许多同行质疑、责难现代文学辑佚之学的理由。不过,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这种批评仍然是将现代文学文献学视为文学史(或是历史)附庸的文献史料研究,实际上是将“文献学”和“史料学”等而同之、混为一谈。老实说,如果我们仍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视野中看待文献史料工作,或是幻想着通过一些新资料来颠覆、改写文学版图,或许注定是一种徒劳。因为作为研究者/解释者,我们既无法完全摆脱,离开现有的学术积累(可能常常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书写中)和各种前理解(当然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各种“主观性”认识),也很难仅凭对某种/些新文献史料的发现、利用,或是对“常见书”不同寻常的解读,从而得出一系列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洞见,甚至一个新的研究、叙述框架,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学史观。哪怕是在纯粹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样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我们很难说陈寅恪对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的研究,就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洞察到“文献学”和“史料学”的不同,体认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发展纯粹的文献学研究的可能。这一研究和作为文学史(或是历史)附庸的文献史料研究的不同在于,“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史料问题,史料整理是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现代文学也首先需要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们的史料学。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就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核心文本成为文献学追逐的目标确实是学术向更高层面重新发动的标志,同时也是学术精神的淬炼和提升。”(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就纯粹的文献学研究而言,其需要我们在中西、古今文献学的学术传统中发展出一种真正以现代、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为之建立其独有的方法论和学科规范、边界的文献学,而在这一研究图景中,搜集整理资料只是小小一环。就此而言,“考释”何干)对文献学、史料学传统的隔膜的研究现状,也需要反思和纠正。当然,概念术语、研究工具方面的问题,是两者都必须共同面对的,学者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摸索、调整,如笔者力主在近现代文献研究领域慎用“佚文”概念,可喜的是,近年来渐已为“集外文”说所取代。与现代文学文献已属历史遗迹不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更加贴近当下生活,常常与政治、社会环境同频共振,且以我们“贵远贱今”的普遍心理作祟,许多文献史料未能及时、有效保存,人为造成的散佚、毁灭现象较为突出,一些重要讲话、会议记录的查阅和对档案资料的积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不便阅读、研究和传播,颇值努力发掘、利用。许多重要当代作家、社团、流派的资料,还有很多空白需要搜集和整理。同时,因其资料种类增加、数量更为庞大,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是否、如何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整理海量的互联网文学资料,就成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者需要探究、思考的问题。

另外,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对现代文学资料的研究,基本上是文献、历史研究,只有一小部分实物、口述、访谈的音视频资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除了作家作品(书籍)、报章杂志、手稿,尚可有大量口述、访谈、田野调查、特殊的出版史和书籍史资料及各种形态的多媒体资料作为凭借。因此需要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远不止是普通的文学批评、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几种。这也就意味着从事相关研究时,不仅需要师法古文献学和现代文学文献学,还需要更多的“视域融合”,让“不同的视域相互克服彼此的局限性,达到更大的普遍性”。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感觉派佚文发掘、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关于文学史料研究工作的一点看法

□宫 立



樊俊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更需要“正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和自身暴露出来的日益明显的弱点”。

借助数据库发掘文献,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得保持警觉,有时候数据库里的文献并非期刊原貌,“故纸堆”是需要研究者去亲自翻阅的,不管是期刊还是报纸,得一期一期、一页一页地看过去。泛黄的报刊是有味道的,是充满历史感的,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时代背景。从事史料工作需要耐心,需要定力,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民间业余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要下真功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接力者的事业,需要水磨功夫,需要“甘于寂寞、一辈子埋首故纸堆,以史料工作作为自己惟一事业的专门家”。看似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很低,但实际上需要专门的学术训练,真正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夫的“专门家”并不多。有不少研究者是半路出家或者是临时起意,在翻阅文献的过程中,看到一篇文章不见于已有的作家全集,没有做过详尽的文献普查工作,就贸然地判定它是一个“重大发现”。已经收入作家自己编的集子,或者已经被其他研究者公布,还堂而皇之地被视为“重大发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全集未收录,不代表作家的年谱没有记载,更不代表其他的研究者没有公布。再者,现代作家的文章,有的发表不止一次,有多种版本,有时只是更换了题目,或者节选了部分,抑或文字上有较大的变动。判定一篇文章是否是佚文或集外文,需要慎重再慎重。每个人对于同一个文献,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首发权是需要尊重的,得做足

功课,不然会闹笑话。

史料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要落到实处,需要精耕细作。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使用工具书,比如作家的笔名录、年谱、研究资料以及文学期刊目录、文学编年史等。工具书最重要的功效是使用。因此,判定好坏的唯一标准是它们是否切实地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编纂一部“覆盖面广、收录齐全、内容比较精确可靠而又检索方便”(孙乃修编:《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的工具书,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并非一件易事,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徐迺翔、软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的唐广、韩之友、封世辉、舒友、孙庆升、顾盈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是可用的,我们可以按图索骥。而有些期刊著作或者编年史,体量很大,却不实用,想查某个作家在某期刊的发表情况或者某年的文学创作实绩,要么一团乱麻,要么一片空白,大而无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收录的数十种作家研究资料,包含作家传略、生平活动、著译目录、研究论文选编、研究资料目录等,花费了编者们大量的精力,限于当时编选条件的困难,不可避免会有各种遗漏或者错误,但今天依然可以使用,查找起来让人感觉踏实。如今编选条件比那时便利多了,但有不少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编选的水平亟待提高,名为作家研究资料,实为论文选,名不副实。有的作家人

谱只是作家重要文章的罗列,并未真正呈现作家的创作史、交游史,最多只是加长版的创作年表而已。作家的自白、回忆不能直接入谱,有时说法不一,不能全信,特别是作家后人所写的传记、评传之类的文字,多有溢美、掩饰之词,使用起来更要慎之又慎,需要互相参照,认真考证。从年表到年谱,再到年谱长编,绝不只是字数的增多,而是更为详实更为立体地呈现作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信可用的工具书永远不过时,豆腐渣工程只能速朽。

史料工作需要理论的总结和提炼,但它更需要身体力行的耕耘和摸索。它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进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现代作家的联名宣言、声明、创作等集体署名的文献,版权人究竟是谁?报刊上刊载的作家演讲稿是否是作家讲演的原话?作家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比如检讨书,是否是作家的本意,是否都应该收入作家的全集?这些特殊文献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我们反复讨论、论证。单是《鲁迅全集》《徐志摩全集》已经有数个版本,但至今还存在各种问题亟待解决,更何况其他作家?作家全集的编纂不可能一劳永逸,其他史料工作同样如此。中国现代文学需要做减法,进行经典化,也需要做加法,进行拾遗补缺。当然拾遗补缺也不是没有限度,散佚的经典作家的作品或者一般作家的优秀作品,都需要打捞。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是为了摸清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底,是为了深化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不是为了“沉渣泛起”,不是为了打捞而打捞。

史料文章有各种写法,无需拘于一格,但要言之有物。樊俊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长达8万字,陈子善自言“此文写于22年前,我多次重读,至今仍让我感到亲切和富于启发。我后来指导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一直把樊先生此文列为必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文献之一”(陈子善:《记忆中的樊俊先生》,《文汇报》2011年12月10日)。陈子善的《不日记》系列每篇都不超1000字,既有料又有趣。樊俊的长文不会让我们感觉冗长,陈子善的短文也不会让我们感觉“虎头蛇尾”,它们都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如今有些史料文章动辄上万字乃至几万字,实际上千字文就能说清楚的问题,绕来绕去,最终也没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行文一定要简洁、切题,“不矜才使气,不炫博争奇”,才能做到“叙述明白晓畅,字句平易浅近”(胡光源:《文人综论》,大东书局1948年版)。同时,文章需要反复打磨。前文提到的8万字长文,发稿前后用了长达6年半的时间。文章在收入论文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他又增添了若干例子。这篇文章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严家炎评价此文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里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作为“现当代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严家炎:《史余漫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文学史料研究是慢工出细活,千万急不得。(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项目资助”阶段性成果)